

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

——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

◎ 叶 攀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附录(CP)目錄附录B

附录B 附录C 附录D 附录E 附录F 附录G 附录H 附录I 附录J 附录K 附录L 附录M 附录N 附录O 附录P 附录Q 附录R 附录S 附录T 附录U 附录V 附录W 附录X 附录Y 附录Z

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

——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农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事件的思考和新
生代农民工的 **叶攀 著**

第二节 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已有研究的回顾：工人的文化自主 / 2

一、新文化的工人或反文化：作为价值规范来源的身体和精
力 / 2

二、独立自主的文化：从一般理论到定性 / 5

第三节 国内现有研究的回顾及理论发展 / 11

一、时

二、世

三、我

第四节 核心概念

一、文

二、文

三、文

四、文

第五节 研究设计

第六节 Q村简

第七节 全书主

第二章 被压抑的文化：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压抑

第一节 文化压抑的概念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 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叶攀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671-2830-9

I. ①文… II. ①叶… III. ①民工—研究—中国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8523 号

责任编辑 焦贵萍

封面设计 缪炎栩

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

——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

叶攀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02 千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830-9/D·196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农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讨薪”事件的思考和新
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话语 / 1

第二节 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已有研究的回顾：工人的文化自主 / 2

一、跨文化的工人自发文化，作为价值规范来源的身体和体
力 / 2

二、非自发性的文化：进一步强调肯定性 / 5

第三节 国内现有研究的回顾及相关背景 / 11

一、国内研究现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断裂 / 11

二、世界其他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工人文化比较的相关问题 / 16

三、我国工人文化的历史背景 / 17

第四节 核心概念：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 / 19

一、文化理论的相关问题：工具论与价值论 / 19

二、文化压抑 / 21

三、文化自主 / 24

四、文化压抑的具体组成部分 / 29

第五节 研究方法：话语分析，主体和客体的结合 / 35

第六节 Q村简介以及研究过程 / 37

第七节 全书主旨与篇章结构 / 43

第二章 被压抑的“社会”意识 / 45

第一节 被压抑的需要：“道德经济学”和不平等的承认 / 45

一、“道德经济学”、需要和权利 / 45

二、徘徊于弱化的“道德经济学”和 market 规则之间：话语

分析 / 50

第二节 被压抑的男性气质 / 58

- 一、男性气质的相关问题 / 58
- 二、压抑的男性气质(一):被压抑的体力文化 / 64
- 三、压抑的男性气质(二):服从性的家长 / 70
- 四、压抑的男性气质(四):小结 / 74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77

第三章 自我否定的价值规范 / 80

第一节 文化和价值规范,文化自主与肯定:进一步讨论 / 80

- 一、文化和价值规范与社会阶层:进一步讨论 / 80
- 二、文化自主的肯定意义:进一步讨论 / 86

第二节 自我否定的价值规范(一):对教育、文化资本和市场的顺从 / 89

- 一、教育、文化资本与自我否定 / 90
- 二、老板和白领的素质与能力 / 98
- 三、本部分小结 / 103

第三节 自我否定的价值规范(二):“新工人”认同的软弱无力 / 108

第四节 自我否定的价值规范(三):断裂、破碎的话语 / 115

第五节 自我否定的价值规范(四):非文化 / 120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124

第四章 退出:失去意义与自我强制 / 128

第一节 退出、呼吁与忠诚,从物质利益计算到社会维度 / 128

第二节 物质生活的退出:退出城市 / 130

第三节 社会生活的退出(一):自我隔离 / 134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退出(二):失去意义的城市生活和打工生活 / 139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143

第五章 希望 / 148

第一节 城市与工友们的希望 / 148

第二节 通往希望之路:教育与社会发展 / 151

- 一、通往希望之路(一):社会发展 / 153

二、通往希望之路(二): 教育和文化资本 / 155

第三节 本章小结: 再生产 vs 希望 / 159

第六章 结论: 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 / 162

第一节 现状: 文化压抑 / 162

第二节 承认、需要与主体性 / 164

第三节 从现状到未来, 作为希望的文化自主 / 167

参考文献 / 172

附录 调查问卷 / 196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讨薪”事件的思考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话语

2012年10月,一个被称为“女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的视频登上了各个网站。在这个视频中,一名自称农民工的女性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说话方式,讲述建筑工地的机构中的农民工被用工方拖欠1400多美元工钱的情况。在这个视频中,还有人扮演记者,与“新闻发言人”进行问答。^①

这个事件引起了读者的思考。大家都知道,在实际生活中,外交官背后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而女农民工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力量支持。因此,女农民工的模仿与其说明了他们的力量,不如说明了他们缺乏力量。不过,通过模仿获得应得的收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讨薪本来应该是一件非常理直气壮的事情,为什么她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话语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呢?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不仅是这位女性农民工,而且是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话语状况如何?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是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自身的诉求,并且通过这些话语和社会结构发生关系的。不过令笔者感到迷

① <http://v.qq.com/0122/0115/0115/0115AFT0001209.html>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农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讨薪”事件的思考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话语

2012年10月,一个被称为“女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的视频登上了各个网站。在这个视频中,一名自称农民工的女性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说话方式,讲述她所工作的机构中的农民工被用工方拖欠1400多万元工资的情况。在这个视频中,还有人扮演记者,与“新闻发言人”进行问答。^①

这个事件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大家都知道,在实际生活中,外交部背后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而女农民工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力量支持。因此,女农民工的模仿与其说明了他们的力量,不如说明了他们缺乏力量。不过,通过劳动获得应得的收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讨薪本来应该是一件非常理直气壮的事情,为什么她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话语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呢?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不仅是这位女性农民工,而且是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话语状况如何?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是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自身的诉求,并且通过这些话语和社会结构发生关系的。不过令笔者感到遗

^① <http://news.163.com/12/1009/13/8DCLOAFO00011229.html>.

憾的是,国内以往的研究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足够探讨。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们是通过怎样一种叙事表达自身的,更进一步地说,本文要探讨的是,在这种话语中,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他们和社会上层、城市居民以及整个社会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工人文化的问题。

第二节 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已有研究的回顾：工人的文化自主

一、跨文化的工人自发文化,作为价值规范来源的身体和体力

在国际上的工人文化研究中,对工人自发文化的研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研究的对象包括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人,这些研究表明,那些处于差异很大的“文化”中的工人克服了这些“文化”的束缚,发展出相当一致的自发文化。

近年来,随着《上海罢工》(裴宜理,2001)等著作在我国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工人的状况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注意。但是,总的来说,国内已有的这些研究倾向于夸大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工人运动的作用与规模,从而过高估计民国时期大陆工人的地位。事实上,早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国民党当局就对工人运动进行严密的镇压与控制,台湾当局自己也承认,民国时期的相关法规“‘保障劳工权益’流于有名无实,但‘压抑工会组织’的效果却极显著”^①;到了台湾,国民党当局更是长期通过“排斥性统合主义”^②等手段对工人进行全方位压迫。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何明修对台湾工人的研究表明,台湾工人在缺乏激进主义文化传统,“缺乏深厚的文化资源……没有

① 台湾“行政院劳委会”主编,《工运春秋:工会法制80年》,2011年台北,第59页。

② 见王振寰、方孝鼎:《国家机器、劳工政策与劳工运动》。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台湾地区的社会变迁而得到根本改善,见洪士程《台湾劳工运动》,以及张晋芬《台湾公营事业民营化:经济迷思的批判》中对台汽工会抗争的相关分析。

办法发展出属于他们的批判性文化,也遗忘了更早期的运动遗产”(何明修,2006:101)的情况下,工人缺乏有效的、系统性的话语和价值规范与台湾地区的资本家进行对抗,被迫援引战斗性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身体文化,作为“一套关于正义的判准,并且指出未来的行动方向”(何明修,2006:101),也就是说,作为反抗的主要资源。但是,男性气质在成为男性体力劳动者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源的时候,也“进一步巩固了既有的性别不平等”(何明修,2006:66),强化了女性工人的从属地位。所以,男性气质对于工人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男性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源,也能成为强化压迫的机制。对工人男性气质的研究覆盖范围十分广泛,除了台湾地区的工人之外,智利工人也是一个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托马斯·米勒·克卢伯克(Thomas Miller Klubock)对智利特尼恩特(El Teniente)铜矿进行了研究^①。这个铜矿的拥有者布拉登(Braden)铜业公司的子公司试图在该铜矿的工人内建立以一个领工资的男性工人为基础的核心家庭,并试图按照中产阶级市民的标准对该铜矿内部的工人阶级文化进行各种改良。但是,该铜矿的工人“建立了一种基于工作的强烈的男性化理解的阶级认同”(Klubock,1996:442),这样一种阶级认同与该公司的改良企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对这些改良企图——不止包括该公司的改良企图,也包括来自国家乃至工会方面的改良努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抵制,这也为智利工人开展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斗争^②准备了前提。在世界其他地区工人的男性气质也广泛存在。敦巴尔·穆迪(Dunbar Moodie)在《掘金》^③中对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黑人工人文化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南非黑人矿工在种族隔离及其特有的移民劳工体制(migrant labor system)、经济自由主义^④以及南非矿主的严密控制等共同作用下,发展

① Thomas Miller Klubock: *Contested Communities, Class, Gender, and Politics in Chile's El Teniente Copper Mine, 1940 - 1951*.

② 见 Julio Faundez: *Marxism and Democracy in Chile*, 以及 Klubock 的著作中相关内容。另外根据笔者的了解,这种强加公司权威的行为在当时并不是个例,而是相当普遍的行为,比如著名的亨利·福特和福特公司也是如此,见 Berlet and Lyons, 2000 中相关部分的叙述。

③ Dunbar Moodie: *Going for Gold*

④ 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见 Heribert Adam: *The South African Power-Elite, A Survey of Ideological Commitment*, 而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的黑人工人生活也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改善,见 Patrick Bond: *Elite Transition*。另外如 Moodie 指出的,南非矿主大量使用黑人移民恰好是因为一战后南非白人工人发展到起义程度的抗争。换言之,旧南非的种族隔离既是南非尤其矿业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的手段,也是规训和驯化南非白人与黑人工人的措施。

出了特别强调男性气质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要内容有：把社区性的饮酒等活动作为男性气质的象征，发展工人间的社会交往，建立工人团结的手段，通过“道德经济学”提出自身的诉求，还有帮派武斗^①等。在这种文化中，甚至部分黑人矿工都成了黑人工头们表现自身男性气质的工具。具体地说，就是黑人青年工人在同性恋关系中扮演了一般状况下通常由家庭中的女性即妻子扮演的“从属”角色，但是他们反过来在农村地区又扮演了“支配”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南非资本家只提供给工人单一性别宿舍。随着南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非工人的日益组织化，这样一种“文化”也逐渐衰落。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强调身体特征的工人文化，和前面说过的台湾地区、智利等地的工人自发文化一样，对工人的深入抗争也造成了一定程度限制和阻碍，这是南非工人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才恢复组织的原因之一^②。

工人的体力文化不仅存在于上述一般认为的新兴地区，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r)中指出，英国学校中的工人阶级子弟发展出了一种反学校的体力劳动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是反抗学校教师的“规训”，拒绝按照学校的规定行事，并嘲笑在学校中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这种文化还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具备更高的社会地位价值，具备更高的意义。这种文化准确地指出了英国资本主义体制中体力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大多数人不能通过学校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等事实。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是“撤出”了“主流”文化，并且因此再生产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换言之，这种自发文化，同时也是英国工人在社会中的被压迫地位，通过这种反学校的体力文化实现了再生产。霍布斯鲍姆也对这个时期的工人文化进行了研究(霍布斯鲍姆，2001)^③。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对于工人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男性工人而言，他们的体力和身体是他们的唯一的所有物，因此也成为了他们自发文化的一个基本来源。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成了他们对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生活进行判断

① 这种冲突既发生在各个不同的族群之间，也发生在工人和矿方之间，也有像美国那样的阶层冲突以族群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情况。当然，旧南非的“主流”社会也有意识地把工人的斗争族群化。

② 不过，正如下面将要说到的塞德曼的研究表明的，南非工人最终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团结。

③ 其他地区的男性气质研究，详见本书第二章“被压抑的男性气质”部分的介绍。

的最主要依据。同时从以上研究也可以看出,这种强调体力与身体的文化并不受民族和国别的限制,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文化使用了自然的身体作为自我形象乃至相应的价值规范的基础和具体组成内容,而身体是“跨文化”的所以这种文化超越了一切特定的“文化”,是某种结构性的社会地位的产物。这种体力文化也因此不是文化特殊性的表现,而是具有了一种“普遍性”,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国家何种“文化”中,工人阶级的自发文化都具有相同的内容。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上述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的,自发文化的“肯定”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种文化并不能真正抵消与克服现实中存在的、结构性的权力权威和宰制——这一点在19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不断扩张而出现的“男性气质危机”^①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此外,自发文化在成为“话语”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②,限制了工人的抗争。不过,这只能说明自发文化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不能说明自发文化是不值得追求的。具体地说,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文化”将他们的权力赋予了“正当性”,进一步地稳固了并强化了他们的支配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起的是辅助作用而不是决定性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被支配的那些阶级所受到的支配也不仅存在于文化层面,因此也不能仅仅通过文化摆脱被支配地位。但是,比如下面将要提到的查克拉巴蒂研究的印度殖民地工人那样,处于被支配被宰制地位而没有文化作为抵抗资源,恐怕更加不乐观。因此,自发文化是工人凝聚认同,争取自身权益、争取价值和尊严的起点与必经的桥梁,但不是终点。

二、非自发性的文化:进一步强调肯定性

如果说以上研究涉及的都是工人自发文化,那么在自发文化之外,还有一种非自发性的工人文化。这种工人文化不是把工人的身体和体力作为资源,而是进一步地强调“肯定性”,亦即工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诸种结构对他们的

① 见 Linda McDowell: *The Trouble with Men? Young People, Gender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 等。

② 见 Goeran Therborn: *The Power of Ideology and the Ideology of Power* 中对工人自发意识的分析。

限制与束缚,完成自我实现的能力。这种“肯定性”首先是工人运动中的团结,亦即强调工人有能力克服日常意识中的消极、顺从和碎片化,以及资本家采取的各种镇压措施^①;另外一种“肯定性”主要体现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社会主义运动中,这种“肯定性”已经不仅是工人阶级觉醒的标志,而且是对人的自我实现的追求,更是对未来社会的自觉规划。

首先是工人运动中的工人文化。里克·凡塔西亚(Rick Fantasia)对美国工人运动中通过罢工而形成的“团结文化”(Cultures of Solidarity)进行了研究,所谓团结文化指的是“在工业体系和敌视工人的社会中工人团结的积极表达”(Fantasia, 1988: 19)。他通过对新泽西州泰勒铸造(Taylor Casting)公司工人“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②、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医院护士工会的组织过程以及艾奥瓦州克林顿市的一次罢工过程的研究指出,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社区”,与资本家采取的各种破坏工人运动的措施对抗,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团结,并且在罢工中发展出了相应的文化。不过,虽然凡塔西亚认为,工人的日常意识并不能作为工人文化或工人意识的表现,但是,工人在抗争中具体的诉求,具体根据的各种价值规范都是在日常中形成的,这些不能不对工人的抗争造成影响,因此不能将两者脱钩。虽然凡塔西亚自己强调了这种“团结文化”受到的限制,例如美国资本家的“公司行动”(corporate action),乃至美国工会的官僚结构等,但是在笔者看来,凡塔西亚对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造成的限制仍然估计得不够。虽然凡塔西亚认为工人的阶级意识主要是在罢工斗争过程中产生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飞跃的,但是这种飞跃即使能暂时地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限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不能持久地克服这种意识形态,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积累。^③也正是由于这

① 这种文化多见于工团主义, syndicalism。

② 未经工会官员同意,工人自发进行的罢工。

③ 对这种局限性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具体作用的进一步分析,19世纪的情况见 Ira Katznelson、Aristide Zolberg (ed.):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美国部分,20世纪的情况见 Sharon Smith: Subterranean Fire,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 Randi Storch 的研究,以及 Stanley Aronowitz: Cracks in the Bloc: American Labor's Historic Compromise and the Present Crisis. 这种限制也正是造成凡塔西亚自己指出的,在美国资本家反扑的时候,工人的“团结文化”却消失这样一种状况的原因。当然,凡塔西亚的研究对于种种“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参见 Lipset, 1997)已经构成了批判。对这种论调的批判还可以见 Rick Halpern (e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U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以及 Shalev and Korpi, 1980。凡塔西亚的研究也没有涉及美国社会中特别强大的白人种族主义和男性中心意识形态,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大的遗憾。

些限制,美国工人运动流血多而取得的成果少。盖伊·塞德曼(Gay Seidman)则在对南非和巴西工人的研究中^①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亦即巴西和南非工人在社区^②中获得了强大支持——例如为工人的罢工提供资金支持,拒绝替代罢工工人工作,乃至使工人的诉求超出“个人”层面,成为“社会”的诉求,他们通过工会组织的长期抗争以及工厂与社区的互相促进,拥有了比前述美国工人更强有力的“团结文化”,初步打破了行业、地区、性别乃至种族方面的界限,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工人的需要,初步发展出了阶级认同和意识^③,亦即他们能够用阶级和剥削解释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社区所处的状况,并且在抗争时使用阶级^④作为武器和出发点。显然,社区团结是工人自发斗争与团结的基础^⑤,这也是工人超越自身原子化、碎片化的起点。社区团结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前述工人自发文化强调的单个人的体力,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也不再是“否定”的生物性力量,而是“肯定性”的自我实现。这种力量,也使得这些工人运动有了“普遍性”的诉求,而不是像“新社会运动”那样自我限制。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必然支持工人运动的展开。例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对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形成的时期进行了经典研究(汤普森,2001)。但是汤普森的研究并不是英国工人历史的全部,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⑥,也就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人经历了一个“再形成”的时期。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① Gay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② 这种社区正是在巴西和南非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被隔离的工人和其余底层群众的聚居区。此外就巴西而言,这种支持也包括了来自奉行“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天主教组织的支持。关于解放神学见 Christian Smith: *The Emergence of Liberation Theology*。

③ 之所以说是“初步”的,是因为巴西和南非在1980—1990年代及之后的社会变迁说明,工人并没有能够巩固他们取得的这些成果。这方面的状况参见前述 Patrick Bond 的著作, David P. Thomas: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 以及 Loic Wacquant 等学者的相关研究。Seidman 也指出了其后巴西和南非社会的一些不利于工人的发展。

④ 包括一向认为“种族”问题更为突出的南非。

⑤ 显然,这也是美国工人的弱点所在。美国之外的西方工人和社区的关系参见 Jane Wills: *Community Unionism and Trade Union Renewal in the UK: Moving beyond the Fragments at Last?* 等。从反面说,社区的弱化也是西方工人运动出现危机的原因。

⑥ 参见 John Saville: *1848, The Chartist Movement and the British State*。

Stedman Jones)在对这个时期的研究^①中也强调了工人阶级文化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琼斯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这个时期,随着英国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距离逐渐扩大,后者力图把自身的“文化”施加给前者的努力也遭致失败。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原先英国工人运动的主要载体亦即手工业者逐渐衰落,原先的各种文化也逐渐衰退,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从19世纪上半叶第一次形成时期的强调“普遍性”转向强调工人的特殊性,发展出了社区文化,这种文化突出体现在“酒吧,体育报纸,跑道与音乐室”^②(Jones, 1984: 207)中。这种文化“对于外人来说是无法渗透的,但是其性质是保守的”(Jones, 1984: 208),这种保守性主要体现在这种工人文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与规范的接受和承认中。因此,克里斯·班贝里(Chris Bambery)在《英国工人阶级斗争中的神话与现实》(Bambery, 1998)指出,在这个时期,英国工人运动从先前的立场上撤退了,转向了改良主义。因此,正如汤普森、琼斯和班贝里等研究者指出的,英国工人运动的诉求一直没有超出自由主义的范围,即使是直至宪章运动为止的英国早期工人运动,追求的仍然是自由主义式的政治目标,也就是说,英国工人运动总的来看一直停留在这个层次。这样一种状况的结果是使得英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大陆等地区的工人运动相比较为弱小^③。本节之前部分提及了美国工人,但是,美国工人的状况是多样的,玛丽亚·科法拉斯(Maria Kefalas)对芝加哥一个工人社区进行的研究则指出,美国的白人工人不仅像中产阶级那样以“家庭”,更具体地说,能够购买住房作为自我肯定的标志,并且将自身与美国联系起来,把自身塑造为“美国价值”的保卫者,甚至出现了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④。这些都是社区成为工人运动障碍的例子。

社区对工人运动构成障碍的状况不仅发生在英美,查克拉巴蒂

① Gareth Stedman Jones: *Working Class Culture and Working Class Politics*, 关于这段时间的英国工人运动,另见 Margot C. Finn: *After Chartism*。对汤普森著作背景的分析见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② 正如下面将要提到的,笔者这次调查的对象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③ 另外在“二战”后,就工人文化的问题,英国新左翼学者之间发生了一场论战,见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④ 这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状况下会进一步发展成所谓“右翼民粹主义”,见 Chip Berlet and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 以及 Hans Georg-Betz: *Radical Right 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Chakrabarty)在《再思考工人阶级史》^①中对1890—1940年印度殖民地时期孟加拉邦的黄麻工厂工人进行了研究。这些工厂为了尽可能压低成本而忽视工人及其绝大多数需要,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在最低水平,保持工人的移民身份,通过前资本主义性质浓厚的、类似我国的“包工头”的“萨达尔”(sardar)体制控制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工人也就没有发展出比较强的自主文化和自我意识,而很大程度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中。印度的工人运动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极大束缚,虽然工人们有相当激烈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和冲突变成了个人报复,换言之,这些工人“社会”意识受到了压抑。他们的“社区”也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亦即还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与前面讲到的美国和南非、巴西相比,这些“社区”不仅没有支持工人运动,反而起了分化工人阶级的作用,例如不同社区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信仰印度教的工人和穆斯林工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社区是工人运动的辅助,但其本身也要受到更普遍的社会结构的限制和制约,例如印度的这种情况下,社区也是需要超越的。

至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工人文化,也有许多研究。例如,赫尔穆特·格鲁伯(Helmut Gruber)的《红色维也纳》^②研究的是1919—1934年的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的“工人文化”。在这期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运用他们对维也纳市政府的控制,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③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一系列文化组织,对工人的文化活动提供指导。这些文化活动涵盖了住房、学校、医疗卫生、体育运动、艺术、工人图书馆、工人休闲,乃至节日、青年活动、家庭等方面^④。当然,这样一种“工人文化”,和上一部分谈到的其他自发性文化不同,虽然也强调男性工人的力量,但是并不因此而压抑女性,而是强调减轻女性负担,以及男性和女性都平等地成为社会的主人。这种文化尤其强调的是为了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塑造“新人”(neue Menschen),亦即在满足需

① Chakrabarty: Rethinking Working Class History。这里的“孟加拉邦”包括了今天的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

②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Class Culture 1919—1934,当然进行类似活动的远远不止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而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行动,另见 Mary Nolan: Social Democracy and Society,以及 Gruber 书中介绍的德国法兰克福、汉堡和柏林等地的状况。

③ 参见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中的相关内容。

④ 这些活动都是公共性的,比如住宅的厨房等设施就是公用的,因此不同于二战后流行的商业性“大众文化”(mass culture)。青年组织的名字叫“红鹰”(rote Falken)。

要的前提下摆脱了压迫和异化、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也是拥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①。此外,兰迪·斯托克(Randi Storch)对1928—1935年美国共产党组织的芝加哥工人运动进行了研究^②。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样,当时的美国共产党也组织了诸如“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 Reed Club)等组织进行文化传播,他们尤其着重组织在美国社会中受到排斥的黑人和来自东南欧的白人新移民^③。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远远不如欧洲发达,但是其文化活动仍然范围广阔,如罗比·利伯曼(Robbie Lieberman)指出的,这些文化活动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关活动有“讲座、课程、合唱团、剧团、夏令营”(Lieberman, 1989: 15),用参与者的话说,“运动就是我们的社区”(Lieberman, Ibid: 1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强调黑人对美国生活的贡献”(Lieberman, Ibid: 38)是这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毫无疑问,这种和前面说过的,英国工人运动被限制于其中的自由主义主张,以及本书第三章中将要提到的中产阶级的状况有很大区别,自由主义和中产阶层的追求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市场机制的服从之上,而且这类工人文化追求的恰恰是建立在克服、摆脱了“异化”的基础之上的新的团结乃至新的社会,因此比前面所说的那种自发文化基础更为坚实。当然,这种文化的基础已经不再是单个社区,而是超越了种族乃至民族和性别等的、更高层次的团结。

很显然,无论是自发文化还是工人运动中的“肯定性”文化,都是超越种族和国界,也因此超越了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的。这是因为工人,或者说阶级,

① 1931年7月维也纳还承办了第二届国际工人奥运会。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各自组织了同样的活动,并在1937年联合举办了最后一次活动。当然,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自身以及奥地利社会等的限制,这些活动的效果也受到了很大限制。正如Gruber指出的,这种文化甚至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其他领域退却的补偿。除此之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文化的独立作用也是重要的原因,正如格鲁伯也同意的,文化是不能脱离社会经济或政治而单独起作用的。

② Randi Storch: *Red Chicago, American Communism and its Grassroots*.

③ 这恰恰起到了前述“团结文化”无法起到的作用,也部分克服了美国社会,无论是美国统治阶级还是美国白人工人中的种族主义(关于针对东南欧白人新移民的种族主义参见前述Berlet and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当然正如前述Sharon Smith的著作指出的,美国共产党的活动也有很大缺陷,此处不赘。这也恰好说明,前述科法拉斯和凡塔西亚的研究,以及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等实际上正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从19世纪以来就刻意使美国工人保持在自发性、车间(shopfloor)层次——正如Michael Burawoy《制造同意》指出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个层次再生产出来的——的结果。关于这方面另见Michael B. Katz: *Why Don't American Cities Burn?*

④ 本书第三章将再次提及并进一步论述利伯曼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歌曲的研究。其他的相关研究有Richard Reuss: *American Folk Music and Left Wing Politics*等。

是一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一种“共同体”,无论族群或者区域性质的关系,相应地,工人文化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某种特定的族群或者区域的产物。这种文化也因此具有了超越族群和区域,也就是超越了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的普遍性。在自发文化中,这种普遍性依赖身体,而在后一种非自发文化中,这种普遍性就是“肯定”的了。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强调的都是自主性——自发文化的自主性更多地是形式上的,而后面一种文化的自主性则是实质上的了。因此,这两种文化都可以称为“文化自主”。

第三节 国内现有研究的 回顾及相关背景

一、国内研究现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断裂

国内学界传统的农民工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他们的“社会融入”、在城市遭受的权益侵犯以及农民工留城意愿等方面的调查。在这样一种研究中,农民工主要被呈现为客体,他们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被忽略不计了^①。这种客体状态的问题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不可能只是完全被动的客体,都必然、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自己的需要、诉求和观念——即使是被压抑的^②,而不是简单地说“我要社会保障”等——以此为例,不同的“社会保障”不仅在具体内容上,而且在所反映所维护的具体社会结构等也是大异其趣的^③。对于工人们来说,由于他们缺乏通过系统的文章或主流媒体的报道等表达自己的诉求的能力与渠道,话语是他们表达诉求的最重要途径。也正如本书一开始即已指出,后面将要进一步详细论证的,正是在这些

① 比较有趣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科学也是这么对待美国的底层的,见 Michael Katz: The Undeserving Poor.

②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个主观行动的层面,才有所谓“压抑”的问题。

③ 参见 Gosta Esping-Andersen《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